

中共革命史的追憶與詮釋 ——以平江起義為例

• 任 偉

摘要：中共革命史的闡述與追憶受到各種因素制約，例如政治權力、意識形態、時代風向等。革命者在回顧過往時，往往會通過一定的策略，重新構造久遠年代的人和事，以回應時代的要求。本文借助1928年彭德懷領導的平江起義這個具體事例，去觀察革命者是如何把自身歷史與更宏大的歷史敘述聯繫起來。概而言之，革命史的書寫與記憶，明顯受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的影響，但這個影響如何發生作用，需要進一步澄清。就平江起義的敘述來看，不斷向權力中心靠攏是一個策略；凸顯、遺忘以及「再創造」是另一個策略。此外，革命史的闡釋與評價在建國前後雖然在定性層面上來回反轉，但其基本邏輯結構是一致的。本文希望利用平江起義這個案例，藉以剖析中共革命史的書寫與記憶機制。

關鍵詞：彭德懷 平江起義 革命史詮釋 記憶史 政治權力

記憶在本質上是立足於現在並對過去進行重構^①。在此過程中，權力至關重要。福柯 (Michel Foucault) 說過：「記憶是鬥爭的重要因素之一……誰控制了人們的記憶，誰就控制了人們的行為的脈絡……因此，佔有記憶，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關的。」^②中共革命史作為一種被勝利者講述的歷史，權力的深度介入已自不待言。但問題是，政治權力或意識形態如何影響革命史的記憶與書寫，目前的研究並未清晰呈現。這其中關涉到兩個問題，其一，當事者主動記憶；其二，統治者控制記憶。雖然兩者都涉及權力，但前者是靠攏權力，後者則是展現權力。當然，二者有時也合謀共生，相互利用。目前關於中共革命史的記憶研究，總體上還只限於「構想」——理論已被提出，但有個性的具體研究似乎不多。在可見的理論文章中，有些注意到了口述史在群體記憶中的價值；有些籠統地強調了記憶史的方法與意義。這些論述雖

然不無價值，但實際上都是從一般記憶史而來，革命本身的特性未被充分揭示。至於個別實證研究，多側重於描寫革命記憶與敘述的變化，但對變化背後的動因缺乏深刻探討^③。就筆者看來，權力（政治）與歷史（記憶）的糾纏，與其說是理論問題，不如說是實踐問題。因此，本文不擬進行理論深化工作，而是借助檔案材料、報刊雜誌以及回憶錄進行研究，以彭德懷領導的平江起義這個具體案例，來說明政治權力或意識形態對革命史記憶的影響。當然，進而探尋這個影響發生作用的機制，是本文更重要的關照點。

1928年7月，作為國民黨將領的彭德懷率部暴動，中共方面稱之為「平江起義」。1928年底，這支部隊上井冈山與朱德、毛澤東紅軍匯合，成為中共武力革命的源頭之一。與很多其他革命事件一樣，平江起義在後來被不斷追憶。「追昔」的目的當然是「撫今」，在這樣一個潮流中，平江起義極具代表性。第一，它被官方認為是中共革命的源頭，也是中共歷史的起點，與中共革命的核心敘事密切相連；第二，彭德懷所處的權力脈絡變動劇烈，從毛澤東最信賴的將領到「反黨集團」的頭子，後來又獲得平反，其政治處境深刻影響其對早年歲月的追憶，也導致他不斷的回溯與改寫。如果說時代塑造歷史，那麼平江起義恰可為此作註。

一 向中心靠攏：革命追憶的基本取向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後，各地暴動風起雲湧。湖南平江地區的工農群眾在中共領導下數次攻城，大殺地主商人。國民黨當局為平息暴亂，於1928年6月派遣湖南省獨立第五師三個團分別從南縣、華容、安鄉開赴平江「清剿」。彭德懷任獨立五師第一團團長，兩個月前他由段德昌介紹秘密加入共產黨。彭德懷利用團長身份，暗中發展黨支部，並組織「士兵會」，傳播「赤化」思想。7月，因地方黨遭破壞，第一團黨支部中的黃公略、黃純一、賀國中等人身份暴露，眼看要遭國民黨「起底」，7月22日彭德懷果斷發動兵變，先發制人，是為「平江起義」。起義部隊佔據平江縣城，組建紅五軍，大殺土豪，但三天後即遭國民黨大規模圍攻，起義部隊東奔西逃，短短一個月從2,500人銳減到不足1,000人^④。形勢危急之下，彭德懷率部於12月上了井冈山。

平江起義之所以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恰恰就在於彭德懷上了井冈山。要知道，1928年前後，中共領導的暴動數不勝數，平江起義在當時並不十分矚目。它後來之所以能佔據革命史的重要一環，自然與井冈山、毛澤東有關。上井冈山是一個歷史事實，但為甚麼上井冈山，卻可以有很多解釋。

1929年1月，即彭德懷率部剛上井冈山不久，紅五軍黨代表滕代遠向中央匯報情況說：1928年11月27日部隊轉移到東鄰江西的萬載縣，從當地報紙上得知國民黨各派勢力達成一致，正合力「清剿」，因此「回平〔平江地區〕實在是不可能」，「所以半途召集負軍事責和黨務責的同志開一聯席會議，決定暫不返平，直向贛南推進，與朱、毛取聯絡」^⑤。這是目前所見最早的解釋。從滕代遠的口氣看，上井冈山是情況不明下的選擇——國民黨大軍壓進，紅五

軍不能返回平江，也不能投往其他地區，只好冒險繼續向湘贛邊境的井岡山前進。1929年4月，彭德懷率領紅五軍下井岡山後給中央的報告，也證實了之所以率領紅五軍主力前往，是因為湘鄂贛實行大「會剿」，所以決定留一小部分人員在當地游擊，其餘主力都到井岡山與紅四軍取得聯絡^⑥。

其實，除敵人「會剿」外，經濟是另外一個嚴重問題。當時，因「左傾盲動」，地方中共黨部四處鼓勵燒殺，土豪或死或逃，平江經濟毀於一旦，物資獲取相當困難。隆冬來臨，紅五軍「官兵着單衣者很多」，情形「甚為淒憐」。因此，彭德懷與紅四軍聯絡的另一重要動機是為「覓經濟出路」。但當時紅四軍的經濟狀況也不佳。兩軍會合後，紅五軍形容說：「四軍這時的困難，言之痛心，念之鼻酸。」見此情形，多數官兵「都不願留守寧岡一帶工作」，要求去他處游擊，只是礙於前委（前敵委員會）多次討論，才最終留下^⑦。從最初報告看，可以說紅五軍留在井岡山是心不甘、情不願。

很顯然，1928年的毛澤東和井岡山尚不足以讓紅五軍將士心嚮往之。但是，革命勝利後，作為一個標誌、一種圖騰，毛澤東和井岡山成為他們當時熱切眺望的遠方。紅五軍通往井岡山的歷史敘事逐漸經歷了一個由「被動」轉為「主動」、由不得已到積極嚮往的過程。當然，就彭德懷而言，這個變化有其苦衷。1945年華北工作座談會上，彭德懷遭受強大壓力與批判。不少人對彭德懷上井岡山的動機有所質疑，如有人講：「上井岡山來當然很好，但這能說你思想覺悟高？對黨有感情？也許正如你自己所說，你是有大志，原名彭得華，就是志在『得中華』。不要把自己吹得過高。」也有人講，彭德懷在井岡山時期就違反毛主席軍事思想^⑧。在強大壓力下，彭德懷在自我辯護解釋去井岡山的緣由時，就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他說：「這之前，湖南省委曾說朱毛紅軍有十萬，我說不會那樣多，最多一萬，被批評為不相信黨，就想親自去看看；再因為赤白對立太兇，也想去學學。」^⑨此處，彭德懷已經開始有意淡化被動因素，往主動「學」、主動「看」的道路上引。這種虛化具體背景、向中心靠攏的歷史詮釋，已初見端倪。

華北座談會時期，彭德懷雖然有意往上靠，但言說還不算太積極。1959年廬山會議後，他被打為「反黨集團」的首領，被斥責為「陰謀家」、「野心家」。8月29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第一綜合小組還特地審查彭德懷關於平江起義問題的論述^⑩。在此局面下，彭德懷再論平江起義，又是一番新說法。他說起義成功後，就認識到要以井岡山為旗幟、為榜樣，「這個旗幟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是實際的，不是空洞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是失敗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岡山會合，形成了當時的朱毛紅軍，成為紅軍旗幟，不僅有號召作用，而且要在紅軍發展中成為統帥，使全軍有頭」^⑪。如果說在1928年，彭德懷就認識到井岡山是旗幟，毛澤東是全軍的頭，那只能說他是天才預言家。事實上，1928年毛澤東正被中央嚴厲批評，他剛當選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被撤銷，而且一度誤傳被開除黨籍。造成這個嚴厲處罰的緣由，恰是因為他在秋收起義後，不執行中央命令，放棄攻打長沙，擅自退往井岡山。可以說，在1928年，井岡山的旗幟是受中央嚴厲批判的，不可能有「號召作用」。很顯然，彭德懷把後來的認識大大提前，並用來重新解釋歷史。

解釋完背景後，彭德懷進一步聚焦到毛澤東個人身上。他接着講了上井岡山的兩個具體原因：第一，「根據省委〔湖南省委〕指示，我和滕代遠、鄧萍、賀國中、李燦、張純清等同志率五個大隊去井岡山與紅四軍取得聯繫」；第二，「實際我自己也想去『取經』，想弄清革命的性質，分田怎樣分法等等問題」^⑫。先講時代背景，再講具體契機，把個體行為與時代因素融會貫通，並建立二者的一致性，是典型的革命史解釋套路；彭德懷顯然也受此影響。更具趣味的是，後來者解釋彭德懷發動平江起義的緣由時，也基本上遵循這一解釋模式^⑬。

此種層層遞進、看似邏輯嚴密的因果推演，從歷史上看卻未必靠得住。第一，彭德懷說上井岡山的確是遵守湖南省委的指示。平江起義後，湖南省委確實有過指示，令其向萍鄉、醴陵一帶發展，與朱毛取得聯繫。但這裏有兩個問題，其一，這份指示彭德懷很晚才收到。據1929年1月12日滕代遠〈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透露，至1928年8月20日起義部隊才接到省委指示。這充分表明，起義後的軍事部署並非按湖南省委的指示進行^⑭。所謂「根據省委指示」，很可能只是回憶者後來看到檔案，並依據檔案進行回憶與解說而產生的一種顛倒現象。弔詭的是，滕代遠後來似乎也忘記了自己早年寫的這份報告。建國後，他在紀念平江起義的文章中言之鑿鑿地說：打下平江城後，在1928年7月25日的慶祝大會上，就決定「打通湘東、湘贛邊、贛南特委，和毛澤東、朱德同志的紅四軍取得聯絡」^⑮。彭、滕二人把時間提前，主要是為了將平江起義與井岡山關聯起來。這也從一個側面展示出革命史詮釋向中心靠攏的態勢。

其二，如果說時間前置是重新闡釋的一個策略，那麼模糊具體場景、緊握隻言片語，則是另一個策略。1928年7月底，湖南省委雖然指示平江起義部隊向萍鄉、醴陵一帶發展，「以與四軍朱、毛相聯結」，但目的並不是讓他們上井岡山，而是讓其在湘東發起暴動^⑯。事實上，給彭德懷去信的同時，湖南省委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大意是催促其下井岡山，到湘東游擊。中共武裝革命開始後，各省委都希望紅軍能在本地發展。當時，湖南、江西、廣東等都在爭取朱毛紅軍。湖南省委實際上已經催促多次，只是毛澤東不予理睬。1928年7月湖南省委給毛澤東的信中再次講：「以前決定向湘東發展與平、瀏取得聯繫，現在更有萬分的必要。因此，兄處〔紅四軍〕應無條件的立即進攻萍、安。」萍鄉雖然在江西，但一直被認為是湘東經濟區的一部分^⑰。很明顯，湖南省委的真實意思是讓彭德懷與朱毛在湘東會合，共同發動湖南革命，根本不是讓他到江西去。

事實上，彭德懷後來誤打誤撞離開湖南，上了井岡山，反倒令湖南省委很氣憤。例如，省委委員、湘東特委委員潘心源當時就報告稱：起義部隊退出平江時，「一股勇氣到處與敵人作戰」，「他們並沒有看到自己軍隊組織的成份大部分是流氓無產階級組合，不能艱苦耐勞，缺乏革命性，不能與敵人作戰，因此，在瀏、平交界之花橋打了一仗，跑了兩連兵，失去機關槍六挺，子彈無數。在萬載大橋打了一仗，又損失幾百槍，於是他們跑到湖北交界之九宮山，在山上駐了幾晚，又跑回平江。黃公略便帶了兩百槍開到瀏陽，

彭德懷、滕代遠帶了五六百槍，跑到井岡山去了」^⑩。明顯可以看出，潘心源對起義部隊去井岡山的評價很負面，只是他的用語還比較委婉。而湖南省委巡視員蔣長卿則是直截了當地批評，甚至將彭德懷去井岡山定性為「逃跑路線」^⑪。彭、滕等人後來一致認為去井岡山的指示，實際上只是抓住了隻言片語，對具體背景卻置之不顧。模糊處理的用意，自然是要把通往井岡山的道路合理化、正當化。畢竟，被迫前往井岡山之類的言說，在建國後已顯得不合時宜。

彭德懷講的第二點，是說自己想去向毛澤東「取經」。建國後，個人崇拜是中共黨內的一種普遍現象。任何事情，只要能和毛澤東沾上邊，人們無不緊緊把握。毛澤東巨大的個人威望，影響了很多革命者對自身歷史的追憶。彭德懷說向毛澤東「取經」，其實還算是比較「客氣」。曾參與平江起義的士兵李壽軒後來的說法就更為誇張。他回憶說，起義部隊退出平江後，正不知到哪裏去，「這時，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紅四軍在井岡山搞得轟轟烈烈。於是，領導上便決定投奔井岡山」。兩軍會合後，李壽軒講：「井岡山，這是多少天來我們一直就嚮往的地方啊！」每個人都興奮異常，因為「久為我們大家敬仰的毛黨代表和朱德軍長，就要和我們見面了」^⑫。李壽軒顯然把建國後對毛澤東的情感大大提前了數十年。李壽軒當時只是一名普通士兵，而對於1928年的一名普通士兵而言，且不要說甚麼「敬仰」，連「毛澤東」這三個字，他甚至都不一定聽說過。彭德懷在1965年就坦承：「我對他〔毛澤東〕過去是不認識。平江起義時，是大哥二哥的關係。到1928年才認識他」，「那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沒有看到」，〈古田會議決議〉也是到延安後在任弼時處才看到^⑬。彭德懷尚且如此，李壽軒的「敬仰」又從何談起？情感的時空錯亂，雖不一定是有意造偽，但錯亂本身卻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個體的當下訴求。「取經」與「敬仰」之類的說辭，無疑是重新解釋自身歷史、貼近中心權勢的一種策略。

把自身歷史與更宏大的歷史關聯起來，重溫過去的榮光，自然是因為有現實的關懷。尤其對彭德懷而言，在廬山會議之後，囹圄之中的自傳肯定不可能完全是夫子自道，他需要通過重新詮釋歷史來疏解現實的困境。因此，回憶與解釋就不可避免地摻雜大量現實因素。放寬視野看，與彭德懷同時代的很多人一樣，其實都在用類似的方式「求生」。應該說，向中心意識形態靠攏，是那個時代普遍的生存方式。彭德懷等人的追述只是時代文本的一角，對此或不必要苛責。

追憶者的明顯漏洞，在整整一個時代裏都沒有被指出，這絕不是因為知識上的欠缺。「史觀」上的集體默契，或許才是主要原因。眾多參與者如滕代遠、黃克誠等，在後來的追憶中都一致認為起義部隊當時就嚮往井岡山、嚮往毛澤東開闢的革命道路。例如黃克誠講，平江起義後不久彭德懷就指出：「井岡山是烏雲滿天中的一顆明星，是湘鄂贛根據地和其他根據地的指路明燈。」他堅信毛主席開闢的井岡山道路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⑭。滕代遠甚至把起義爆發的緣由牽扯到井岡山。他說：「在井岡山紅旗的影響下，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舊曆六月六日）。在湖南平江，由我黨直接領導爆發了平江起義。」^⑮此種因果構建，顯然已經走得太遠了。本文無意

譴責他們記憶錯誤，但此種講述，如同皇帝的新裝，招搖過市數十年卻無人揭破，就很值得深思。革命史中大量因果顛倒的回憶不斷雷同出現，說明向中心靠攏的闡釋原則不僅被普遍接受，而且已經深入到日常言說中，並深刻影響着一代人的思維結構。革命先賢敘述往事時，既深受這個結構影響，同時也在增磚添瓦，不斷加固。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與平江起義最早聯結起來的不是井岡山，而是廣州暴動。1932年7月，紅三軍團印發的〈為平江暴動四周年紀念宣言〉明確講：「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的平江暴動，是中國蘇維埃運動洪流中的一個驚人的狂濤巨浪。這一暴動是追隨一九二七年廣州暴動之後而勝利的爆發的，他的特點是：依據了廣大工農兵士群眾的自覺。」^{②4}可以說，向中心靠近的暗流在那個時候已初現端倪。只是1932年，毛澤東正處於全面失勢時期，井岡山不可能成為被攀附者。建國後因為權勢轉移，攀附對象隨之更換，但基本邏輯是一致的。

二 凸顯與遺忘：革命闡釋的策略

歷史追憶如同相機攝影，一定會有場景和角度選擇，基本上包含一個遺忘與銘記的過程。具體到平江起義，追憶者一致訴說的與他們一致保持沉默的東西，都大可令人玩味。因為，在凸顯與留白之間所彰顯的恰是講述者的微妙心態。

革命追憶者銘記的是自身的苦難史。例如，敵人如何壓迫、如何殘酷、如何屠殺等，是他們反覆講述的往事。李壽軒回憶平江起義時特別講到，平江縣政府、清鄉團「胡作非為，敲詐勒索，橫行霸道」，政府監獄關押八百多名革命群眾^{②5}。李聚奎也曾提及，清鄉隊經常下鄉殘殺群眾，搶奪財物，在他們眼裏幾乎是「無農不暴，無工不匪」^{②6}；而田長江對殘殺慘況的講述更為細緻，他回憶說：每天早晨和午飯後，就聽見「達——達——達」低沉而淒厲的殺人槍聲，「天天殺，一天兩次的殺，每次殺十來個」；「龍門周家有個兒子當了農會主席，九十三歲的老公公殺了，兩歲半的孫子殺了，全家都殺了」^{②7}。平江游擊隊第三區指導員方強回憶說，清鄉司令閻仲儒到平江後，當天下午就大舉搜捕革命同志。幾天之內，被殘害的就有好幾十人，以後陸續逮捕的共達一千餘人，「一批批押往柘樹坪、月池塘進行集體屠殺」^{②8}。鍾期光也回憶稱，暴動之後，平江很多地方被血洗一空，所有房屋被燒毀，所有人民不准在山裏居住，無數勞動人民被屠殺。地主豪紳「不管你是否參加過革命，也不論男女老少，見人就殺」，他們把共產黨員和同情支持革命的農民群眾及其親屬，統統叫做「暴徒」，抓住就殺^{②9}。

革命者對受害情節不厭其煩地描述，一方面是樹立正義性、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情感的宣洩。勝利者在講述苦難與傷痛時，總是容易生發豪情壯志，而這種情緒往往會牽引着他講述更多。所以，革命者的回憶錄中通常都有一段苦難史。雖然他們偶爾會對苦難有所誇大，或者改動某些細節，但

總體而言，那些遭遇在他們生命歷程中的確真實存在過，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他們後來的人生。具體說，1928年前後，平江地區的革命群眾確實遭受過慘無人道的殺戮。國民黨及地主武裝的野蠻，給革命者留下長久的記憶。

從各種史料上看，「白色恐怖」絕非虛言。例如，1928年6月中共醴陵縣委報告稱，國民黨清鄉軍隊大肆屠殺革命群眾，湘潭一個月內就殺120餘人，其中共產黨員70餘人，其他皆屬錯殺。清鄉軍隊設置箱子，鼓勵群眾暗報與互相檢舉，受牽連者眾多。一經被舉報，即用殘酷刑罰，如釘兩掌懸於壁上、用火燒背等，不招供者每昏死幾次還不放手；遭冤枉者，數不勝數^⑳。1929年7月，湖南省委巡視員夏尺冰也報告稱，敵人在赤區完全採用大燒、大殺、大搶的手段。瀏陽、銅鼓、平江等地，簡直見不到一所沒有被燒過的房子。在敵人眼中，赤區的民眾，不論老幼，都變成了刑場上的要犯^㉑。12月，另一巡視員蔣長卿也有類似報告。他說敵人在平江地區燒殺非常厲害，一到赤區基本上是見人就殺，引頸受屠者，從呱呱落地的小孩，到六七十歲的老人不一而足。除殺人外，清鄉團還將民眾的房屋、穀米、農具等焚毀一空。平江全縣被殺的革命民眾在一萬以上，瀏陽全縣被殺的在四千以上^㉒。

地主武裝濫殺無辜民眾，是「清剿」中的一個嚴重錯誤，但中共作為革命的一方，實際上是更早、更主動地向其定義的「階級敵人」全面開火。雙方相互報復與糾纏，很難釐清誰才是始作俑者。但從客觀效果上看，國民黨一方，尤其地主豪紳的報復有利於革命發展。因為愈是冤枉，愈能激發仇恨，矛盾愈不容易平復。1929年瀏陽縣委就發現，反動派大燒大殺，「刺醒了一般民眾憤恨與殺敵的決心，都自動的拼命來找我們革命團體來，更確定了一般民眾革命觀點」^㉓。李壽軒後來回憶說，平江起義後，從監獄中釋放出來的民眾，「像潮水似地湧出來，有的抱住我們，有的含着眼淚拉着我們半天說不出話來，有的當場就要求參加紅軍，有的馬上帶着我們去搜捕反革命……」。整個平江城沸騰起來了，士兵們高舉着槍，人們揮着雙手，重新獲得自由的人舉起砸碎的鐐銬，唱着、跳着、歡呼着：『民主自由萬歲！』『共產黨萬歲！』『紅軍萬歲！』^㉔此番描述雖然有誇張的地方，但的確捕捉到了群眾急欲報復的心態。

共產黨領導的報復行動，後來被稱為「紅色恐怖」。如果說「白色恐怖」充滿血腥與暴虐的話，那麼「紅色恐怖」亦不遑多讓。中共在暴動時期對地主豪紳的殺戮，基本上也是不分青紅皂白，與國民黨屠殺赤區群眾可說是旗鼓相當。平江起義成功後，中共地方黨獲得喘息之機，在軍隊的保護下，他們立即組織赤衛隊捕殺地主豪紳，「不上兩星期，約計全縣所殺的不下二三千」。打下平江的第四天，「因群眾憤恨、歡樂交加，迫切的要求要殺一些肥胖的土豪和貪官來祭旗」，因此「該日計殺了四十多著名的反動派」^㉕。一旦放手殺戮，實際情形相當瘋狂。例如有人講：「平江七十萬人口，至少須殺掉三十萬」^㉖；還有人說：「必須將所有農民的房子燒盡，農民才不會苟安而要求革命」，「又有一位同志說：布爾什維克的精神，便是殺人的精神」。1929年7月，潘心源報告稱，「這次平江所有著名豪紳首領幾乎全數被殺」^㉗。綜合多方史料，應該說此語大體上是可信的。

如果說國民黨有冤殺，那麼中共的冤殺其實也不在少數。從理論上講，濫殺是不被允許的，但在生死對決、相互報復的大背景下，國共兩黨實際上都沒有足夠的掌控力阻止濫殺。當時，地方士紳譴責中共濫殺的聲音不絕如縷，例如在清鄉報告中，國民黨就經常援引地方人士的話語，說中共游擊隊「所到之處，屠殺焚燒，備極殘酷」^⑳；共產黨殘殺縣長、督察員及紳士多人；中共游擊隊所到之地，「所有該地小康之家，各機關供職人員，經商各戶人等，均被屠殺，甚至嬰兒亦遭殘殺」^㉑。諸如此類的控告，當時比比皆是。中共後來一概斥之為反動派的污蔑、造謠，但從歷史材料看，恐怕未必全是不實之詞。1929年，滕代遠向湖南省委匯報平江、修水、銅鼓三縣的工作時就指出，地方負責同志有很嚴重的大燒、大殺、大劫的盲動傾向。例如在修水的一些地區，「當暴動時，大屋燒得精光，豬牛雞鴨衣服棉絮如洗，並殺了很多的人」。平江的鄉村市場商店也被燒得精光，「一切日常用品無處可買，要點甚麼東西，也無處可買」^㉒。彭德懷向中央匯報時也認為，赤衛隊犯了大燒大殺的盲動主義錯誤，以致鄉村經濟完全破產，「農民數日不得食」^㉓。可以發現，中共自身的報告與敵對者的說辭具有很強的一致性，只是在價值立場上稍有差異。

公允地說，自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後的一段時間裏，國共兩黨都實施了非理性的殺戮。1928年醴陵縣委的報告最能反映這一點：白天，地主武裝實行「白色清鄉」；夜晚，農民武裝實行「赤色清鄉」。兩方都異常殘酷，地主豪紳講：「出城五里，便要血洗」；工農說「要把縣城燒盡」^㉔。然而，革命者後來的追憶，卻把國共雙方的「對殺」演繹為一場「壓迫與反抗」的故事。凸顯與隱藏某些情節，是其常用的敘述策略。概括來說，幾乎所有革命者的追憶，都有意無意地省略了「殺人」的細節，重點講述了「被殺」的情節。通過不斷的重複講述，不斷地省略與突出，一條強大的邏輯便逐漸凸顯出來，即敵人是兇殘的，革命是受摧殘的，因此反抗是合理的。例如，滕代遠回顧起義前的情況講，國民黨派閻仲儒到平江來當清鄉司令，「到處捕拿屠殺革命群眾」，因此，「有壓迫就有反抗」^㉕。鍾期光講得更為細緻，他說國民黨劊子手清鄉的口號是：「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枉放一人」，平江一些地方的「所有房屋都被燒光」，「無數勞動人民被屠殺，起碼的生活條件也不能維持了」。在此情況下，紅軍武裝堅持鬥爭，「晝伏夜動，積極地打擊敵人」^㉖。他們絕口不提「紅色恐怖」的細節，只是說因為「左傾盲動」，犯了一些錯誤，便大而化之地放過去了。放寬視野看，省略具體細節，用一兩個概念名詞去解釋過失，大概是中共處理敏感歷史問題的常用方式。

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或會被徹底遺忘。不過，決定記憶的實際上不是時間，而是時代風向。在階級鬥爭激烈的年代，「紅色恐怖」雖然總體上被定性為「過左」，但為了彰顯對敵鬥爭的正當性，某些細節還是可以被當作正面材料來宣揚的。例如，方強在1958年談「紅色恐怖」時，就不再講其錯誤，而是納入階級鬥爭的敘述中。他說游擊隊員白天在田裏生產，看到有人出城就去盤問，「如果發現是逃跑的土豪劣紳，就押到山坡上去，兩鋤頭結果了他」^㉗。文化大革命時期，為揭發批鬥彭德懷，人們再次想起平江起義前後的殺戮情

節。一位老貧農在揭發彭德懷時就講，1928年5月，「彭德懷一到平江，就帶着國民黨的地方武裝——挨戶團，進攻平江東南一帶的游擊區。這些嗜血性的野獸，見人就殺，見房子就燒，見東西就搶，殺害了很多游擊隊員和貧下中農。不久，彭德懷又帶着他的部隊和挨戶團、土豪劣紳進攻蔣山、蘆洞和安定橋一帶，僅在蘆洞就殺害了我游擊隊員、貧下中農五個人，燒毀房子幾十間，搶掠的東西不計其數。我們貧下中農對彭德懷這個壞傢伙無不咬牙切齒，痛恨萬分」^④。這種把「罪惡」一股腦兒推到彭德懷個人身上，說「平江起義彭德懷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的敘述^⑤，顯然不公平。建國後劇烈的政治變動，不僅解放人們的歷史記憶，實際上也可能鼓勵落井下石的污蔑和濫罵。

改革開放後，階級鬥爭的話語淡化，彭德懷被平反，一切記憶似乎又都被封存了。彭德懷的形象又回歸到主流意識形態規範下的話語敘事。例如，1979年1月黃克誠講：彭德懷雖然一度參加軍閥部隊，但他是「抱着為工農大眾尋找出路、為中華民族謀求解放的強烈願望投入湘軍」^⑥。李聚奎講得更傳神，他說平江起義時，「彭總那堅定果敢，冷靜沉着，耿直豪爽，光明磊落的高貴革命品質，給了我不可磨滅的印象，當時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彭德懷對革命的貢獻「永遠在我黨我軍的歷史上閃耀着燦爛光輝」^⑦。由此可見，革命記憶的凸顯與遺忘，每個時代都在發生，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

三 追憶者的「再創造」

進一步講，當代價值通常主導着歷史書寫。然而，過去不可能總是按照當下價值展開。有些事情如「上井冈山」、「紅色恐怖」等，可以通過一定的敘述策略，在大體真實的基礎上，實現歷史與當下的融合；但是也有些事情與當下價值背離得太遠，而這就出現了追憶者的「再創造」。

1958年紀念平江起義勝利三十周年，彭德懷應邀出席座談會。回顧往昔崢嶸歲月，彭德懷感慨萬千，在講述了基本過程後總結說：平江起義是在革命低潮時發生的。起義之所以成功，有以下幾點原因：第一，帝國主義未打倒，封建勢力未鏟除，農民問題未解決，革命形勢良好；第二，有「十月革命」和中國大革命的影響，群眾基礎好；第三，「有井冈山紅旗的影響，指明起義後革命方向和道路」；第四，「平江地區人民和地方黨組織對起義的支援」^⑧。分析彭德懷所言，前兩個方面屬背景性的，是傳統革命史解釋中的「萬能鑰匙」，幾乎可用於解釋任何一次革命事件。彭德懷講的第三點，在前文已有過分析，在此不贅。關鍵在第四點，因為當時參加座談的還有平江地方黨政負責人，所以彭德懷特意提到了「平江地區人民」和「地方黨組織」，並給予高度評價。這既配合當時的情景，也符合黨政軍民「魚水之情」的政治站位。看似無關緊要的一句話，實際上卻大有破綻。

把自身歷史與人民選擇勾連起來，以彰顯革命的合法性，是傳統革命史書寫中潛藏着的一個強大邏輯。彭德懷的表述，實際上正是這個邏輯的延伸與

細化。但問題是，這個表述與史實相去甚遠，所謂地方黨和人民的「支援」，完全是一個「再創造」。

首先，平江地方黨本身的組織性極差，基本沒有支援過彭德懷。1929年1月，蔣長卿對平江黨組織有極嚴厲的批評，如不守秘密，縣區機關和負責人全部暴露在外；不經審查，無條件發展黨員，入黨時多採用「斬香、吃血酒」等土匪儀式；同志缺乏訓練，不能有效指揮軍事行動^⑤，說明了平江地方黨組織很難提供有力支援。更甚者，地方黨是「紅色恐怖」的主要倡導者，他們大燒大殺的行為，嚇跑了很多民眾，給起義部隊帶來相當多困難。滕代遠就報告說，紅五軍到銅鼓，「銅鼓的民眾因被平江游擊隊燒了很多房子（如棋盤坳一帶），所以聽聞紅軍來了，也如修水民眾一樣的逃避和駭怕。當紅軍到銅鼓縣城時，所有男女老幼，各種貨物桶〔鋪〕，一概搬運走了，不但找不到黨的關係，連飯也沒得吃」^⑥。後來，彭德懷也向湖南省委狀告稱，地方黨組織犯了「急進病」和「盲動主義」錯誤，不懂策略，「變為盲子騎瞎馬的硬幹」^⑦。但是他在晚年自傳中卻說，「當我軍向南進佔銅鼓時，沿途群眾很熱情，商店也沒有關門」^⑧。史實與記憶直接相悖，也許不是年代久遠以致記憶有誤所能解釋的。

其次，平江起義是彭德懷暗中串聯黃公略、鄧萍、黃純一、張榮生、賀國中等幾個秘密同志發動起來的，地方黨組織完全不知情。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時間倉促，交通不便。彭德懷當時是秘密黨員，地方負責人不掌握情況，分不清敵友，加上他剛到平江不足兩個月，還沒有同地方黨接上頭，起義就爆發了。第二，彭德懷本人對接觸中共地方黨也不積極。來平江前，他曾駐扎在南縣，與地方黨有過聯絡，但帶來很多麻煩。1929年10月，他向湖南省委講述平江起義前的情形說：那時南縣黨部不守秘密，「今日來向軍隊要槍彈，明日要油印機等物，領去後在鄉間大燒大殺，因此把軍隊和黨鬧成半公開」^⑨。於是在移駐平江後，彭德懷有意與地方黨組織保持距離。第三，起義是因為軍隊中的黨支部被敵人發現而臨時發起的，事先來不及籌劃，因此沒有辦法取得地方黨和民眾的支援。總而言之，平江起義完全是單獨的軍事暴動，地方黨組織所提供的援助並不多。

平江起義時，地方黨沒有及時參與，群眾也沒有大規模發動起來，在當時的史料中多有反映。軍隊負責人和地方負責人後來也都談到了這一點。1929年4月，彭德懷向中央匯報時坦承起義存在四個缺點，其中第一個就是：「在平江暴動時沒有與當地的黨發生關係，準備不充分」，其他缺點還有：起義時黨的基礎完全沒有，以致敵人壓迫最厲害的時候，常發生動搖與叛變；黨的訓練極少，組織紀律性差，官兵不肯上山，總要佔城市，以致免不了硬戰等。彭德懷的自我批評或多或少說明，起義基本是靠個人主持局面，與地方黨和群眾沒有太大關係^⑩。

其實，即便是起義爆發後，地方黨提供的支援也很有限。例如，起義軍開往修水時，此地黨員不過三四十人，除幾個學生同志對黨的觀念稍有了解外，「餘均為一批掛名充數的」，大都躲在家裏不敢出來。起義軍後來佔據優勢，地方黨伺機打劫，不但沒有幫助，反而添了不少亂子。例如，他們壓迫

群眾入黨，「喊為寫降書」，每次二三百人，「如敢違者殺其人，牽其豬牛，奪其財物，焚其房屋」^⑤。又比如，平東的地方黨瞞報信息，誘騙紅五軍進攻敵人重兵把守的長壽街，導致重大損失。更甚者，進攻失敗後，「平東的黨不但不將散兵收集，反將散兵的槍支繳了，反令赤衛隊將士兵暗殺，希圖擴大赤衛隊的武裝組織，同時地方同志如在紅軍裏拖槍杆跑回縣者，黨部即賞洋一元」^⑥。彭德懷當時非常憤怒，對地方黨沒有任何好感。因此，1929年12月，湘鄂贛邊界特委書記王首道向中央匯報情況時就談到，平江起義有兩個嚴重缺點，其一，過份誇大自身力量，單純地進行軍事冒險；其二，缺乏當地黨的領導，缺乏聯繫群眾，致使軍隊處於孤立狀態^⑦。

平江起義時軍民疏離的記憶一直持續到抗日戰爭前。1936年，滕代遠寫中共軍隊發展史時還提到，平江起義的最大缺點就是未能與地方黨部和游擊隊發展緊密關係，「所以很難與廣大工農群眾配合起義」^⑧。諷刺的是，半個多世紀後，滕代遠再次談平江起義時，與彭德懷一樣，也進行了「再創造」。他說起義前，「我們還寫信通知平江縣委，要求他們組織全縣的赤色武裝力量」，「發動廣大群眾來配合起義」；發起暴動時，軍隊、民眾、地方黨組織一起行動，聲勢浩大^⑨。

不難發現，革命者的「再創造」基本都發生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後。革命年代，革命者尚且能夠實事求是地進行自我評價，有時甚至會進行非常嚴苛的自我批評。但奪取政權後，回過頭來重新解釋自身歷史時，事情卻開始起變化。就歷史觀念而言，最大的變化是批評開始讓位於讚美。革命年代，中共必須嚴肅、坦誠地對待過去，因為只有盡快糾正錯誤，才能在殘酷的鬥爭中生存下來。中共那個時候對自身歷史的總結，是面向內部的說話，主要是提供經驗教訓，因此非常誠實，而且充滿反省精神。革命的內在結構約束着人們不能隨意「再創造」歷史。

奪取政權後，革命者的「再創造」比比皆是。追其緣由，環境的變化應是主要原因。首先，競爭對手被消滅，壓迫感降低。當環境不再具有強烈的壓迫性，或者說過去的事情已很難影響到當下的處境時，人們對過去的敏感性、坦誠性都會大大降低。與此同時，任意解說、隨意打扮的風險也隨之上升。其次，歷史的目標與任務發生變化。革命勝利後，歷史的主要作用不再是鑒戒，而是教化，其言說對象逐漸由內部轉向外部。通過歷史向民眾提供一種道德的、意識形態的訓誡，是中共奪取政權後的主要關懷。在這個過程中，主事者會按照當下的劇本剪輯材料，但造成的結果是，歷史呈現愈有系統，距離事實就愈遠。最後，強大的意識形態、單一封閉的社會系統，使「再創造」成為可能。在開放的環境中，各種層次、各個角度的訴說者都可以參與進來，明顯的謬誤很容易被拆穿，過於離譜的「再創造」，不太容易匯集成流。但在思想封閉的社會系統中，一切都被規範化，不合規範的言說或被剔除，或自我禁忌；遵照當下劇本的「再創造」儼然成為權威。總體來看，「再創造」本身有一套敘事結構和邏輯體系，它不僅指導着未來，而且還規範着過去。因此，彭德懷、滕代遠等人的「再創造」，必須在這個結構下加以理解。

四 革命史評價中的極端化傾向

傳統革命史臧否事件人物，通常有一個傾向，即極端化思維——或者全惡，或者全善，幾乎沒有中間地帶。此種極端的評價方式，與傳統史學中的「善善惡惡」似有相通之處。中共革命激烈反傳統，但在思維方式上卻與傳統不謀而合，此中緣由值得探討。具體到本文的研究，中共關於彭德懷和平江起義的歷史定位不僅極端，而且經歷了一個過山車般的來回翻轉。歷史從一端到另一端，最後再轉回來，表象上的劇烈震盪令人眼花繚亂，但究其內裏，實際上只不過是政治掛帥，記憶必須服務政治需要而已。

政治把歷史評價推向極端化的一個重要手段是製造紀念日。平江起義作為革命紀念其實很早就已開始。1930年，即起義發生兩年後，它就被定為紅五軍的紀念日。7月22日，湘贛邊境各縣的工農群眾與紅軍部隊分別舉行隆重的紀念大會，紅三軍團尤其用力，進行了極大的政治鼓動。紅三軍團的歷史淵源確實與平江起義息息相關。但是，革命紀念絕不僅僅是為了回顧過去的榮光，它更重要的目的是激勵現實。當時有兩個背景，第一，1930年7月中共中央正處於李立三「冒險主義」統治之下，要求擴大紅軍規模，各地都在響應號召，全力「擴紅」。平江紀念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擴紅」，當時提出了「擴大紅軍第三軍團達到二萬戰士的口號」。第二，為響應李立三提出的「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號召，彭德懷當時正率領紅三軍團攻打長沙。此時發起紀念自然有鼓勵士氣的用意，會場上「奪取長沙勝利」的口號即是一表徵^②。可以說，從最初紀念時，平江起義就與現實緊密相連。

放寬視野看，平江紀念只是眾多革命紀念日中的一個。中共當時發明了很多革命紀念日和節日，最著名的當屬「紅五月」。5月這個月份與中共革命有很特殊的聯繫，因為它包含着許多節日慶典，如「五一」國際勞動節、「五四」青年節、「五五」馬克思誕辰、「五七」國恥紀念日、「五卅運動」等。1931年中共開始推廣「紅五月」運動，把這一整個月都當作革命節日。當然，與平江起義一樣，「紅五月」作為頗具特色的慶典，其主要指向不是緬懷，更不是狂歡，而是巨大的政治任務，如「擴紅」、「肅清反革命」、「慰勞紅軍」等^③。將歷史與現實如此串聯，雖然顯得強硬粗暴，但還是有效的，這種有效性既體現在對現實的激勵上，也體現在對歷史的重塑上。

一個歷史事件一旦演化為紀念日，可以想見，關於它的言說一定是飽滿而無瑕疵的。前面提到，平江起義四周年紀念時，紅三軍團起草的紀念宣言就開始把其打造成一個順應歷史潮流的、偉大的、徹底的革命暴動：「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的平江暴動，是中國蘇維埃運動洪流中的一個驚人的狂濤巨浪」，「是伴着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發展而來的」，因此，革命群眾、紅色戰士都應「起來繼續平江暴動的精神」^④。在這個宣言中，四年前的批評與檢討完全被剔除。歷史事件一旦轉向歷史紀念，反思性弱化，宣傳性增強，大概是無可避免的趨勢。1959年前，關於彭德懷及平江起義的評價，幾乎都是在一個標準模型下講故事，可以說是大同小異。但廬山會議後，隨着彭德懷被定性為「野心家」、「陰謀家」，關於平江起義的說法開始出現劇烈變動。

事有湊巧，1958年12月21日，即廬山會議召開的半年多前，彭德懷重回平江，他站在平江第一中學的操場上豪情萬丈地講：「這是我三十年前起義的地方」，又指着一棵梧桐樹說：「這是我當年拴過馬的樹。」他到處攝影留念，題詞贈言，並以個人名義送槍支彈藥給平江一中。平江黨政負責人緊跟着編寫《平江革命鬥爭史》和《怒潮》花鼓戲，弘揚起義精神。後來又在平江一中設立「平江起義室」，並修了一條「彭德懷路」。每年考進平江一中的學生，都要集體參觀「平江起義室」。以後見之明觀之，這一切可謂是平江起義最後的輝煌。半年後，彭德懷被打倒，形勢立即發生逆轉，上述榮歸故里的種種劇情全成為「罪證」。尤其是「平江起義室」，不僅不再具有教育意義，反而成為「妄圖把我們青年一代引向修正主義的死胡同」的鐵證⁶⁶。

對歷史重新評價包含着策略性。就平江起義來看，主事者為了達到反轉歷史的目標，首先是在當事人的動機上下功夫。彭德懷未被打倒前，人們論說其參加革命的動機，通常是階級意識、理想信念、組織動員等因素。其實，這些大都屬於推想。彭德懷側身於符合主流意識形態要求的推想之中，形象光輝偉岸，毫無瑕疵。諷刺的是，因推想而構築起的燦爛形象，在廬山會議後，同樣因推想而坍塌。1959年8月，〈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公布，其中就有對彭德懷動機的推論。〈決議〉指出，「彭德懷這一次所犯的錯誤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會的、歷史的、思想的根源。彭德懷和他的同謀者、追隨者，本質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參加我們黨的一部分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帶着『入股』的思想參加了黨和黨所領導的革命軍隊，從來只願領導別人，領導集體，而不願受別人領導，受集體領導」⁶⁷。自此以後，「入股」成為解釋彭德懷參加革命動機的關鍵詞。歷史轉瞬進入另一個極端，彭德懷身上的榮光完全熄滅。

文革爆發後，《人民日報》批判電影《怒潮》，並借此影射說：彭德懷在當時不過是一個鎮壓平江農民運動的國民黨反動軍隊的團長。由於他在官場鬥爭中失勢，為了找出路，才抱着「入股」的動機，參加平江起義，混進了革命部隊，可見彭德懷根本不是平江人民的「領袖」⁶⁸。稍後，《人民日報》到平江採訪多個革命老人，大家都都眾口一詞地認為彭德懷是懷着「入股」思想參加革命。例如，老地下交通員湯彪講，彭德懷是在洶湧澎湃的平江農民運動的威懾下，又憤於在湘軍整編時沒有當上師長，於是便帶着「入股」思想，混到革命隊伍裏來。解放軍某部排長袁盤良講，彭德懷是一個「屢教不改、反動透頂的老牌機會主義份子」⁶⁹。凡此種種都屬「有罪推定」，但從邏輯上說，這與早年對彭德懷的讚美，實際上是同樣的思路，只是推定的方向不同而已。

動機是個複雜的問題，但人們對於彭德懷的動機解釋，不論是詆譏還是讚譽，其背後的預設都是單一而純粹的。本文不欲深入分析彭德懷的革命動機，事實上也很難完全分析清楚；但抗戰時期彭德懷有過一段解釋，他與斯諾(Edgar Snow)交談時說，自己出身「富農」家庭，只是因為與祖母不和，才離家出走，去當兵⁷⁰。這一解釋未必是定論，但相對來說，更符合人之常情。可是，後來不論是批判還是讚美，人們基本上都不理睬彭德懷自己的說法，反而在意識形態的框架下去挖掘個體心靈的意向。彭德懷被打倒時如此，平反後亦如此。

1978年底彭德懷獲平反。1979年1月，同時被打為「反黨集團」的黃克誠第一時間解釋了彭德懷的革命動機。黃克誠講，彭德懷出身貧寒，只讀過兩年私塾，從十一歲起就給地主放牛，當過煤窯工人和挑土工人，飽嚙了地主資本家的欺凌壓榨。苦難悲慘的童年，使他幼小的心靈中深深種下了對壓迫剝削者的仇恨，磨練出對舊社會的叛逆性格，後來抱着為工農大眾尋找出路、為中華民族謀求解放的強烈願望投入湘軍^⑩。彭德懷的另一戰友滕代遠也有類似說辭，他說彭德懷是窮苦人出身，小時候替地主放牛，參加湘軍，是為人民找出路^⑪。李聚奎則說得更直接、更堅定：「彭總投身革命的經歷，充分顯示了他革命的思想是多麼深厚，革命的自覺精神是多麼堅定，革命的目的是多麼明確，這是革命實踐考驗出來的戰士，是烈火煉出的真金。」^⑫毫無疑問，黃克誠、滕代遠、李聚奎的闡釋都是針對此前的「入股說」。但問題是，他們無一例外都不提彭德懷的「富農」出身，而是按照新時代的政治標準重新構造了一套新的動機。歷史評價尺度只是在新的權力結構下被簡單推向另一個極端而已。從根本上講，黃克誠等人的「人民說」與文革時期的「入股說」，實際上共享着同一個思路和邏輯。

歷史敘述走向極端化，一方面是重新定義動機，另一方面則是改造史實。平江起義是彭德懷領導的，這本來是一個「鐵定」的事實。但隨着文革的激烈推進，政治完全主導歷史，以往堅固的東西開始鬆動崩塌。1968年《人民日報》刊文說：「一九二七年九月，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了震驚世界的『秋收起義』。平江地區部分工農赤衛隊響應『秋收起義』的偉大號召，跟隨毛主席上了井岡山。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平江地區的革命烈火，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點燃的。」如果有人篡改史實，「把彭德懷打扮成平江人民的『救世主』，把平江地區農民運動的偉大功績一古〔股〕腦兒記在彭德懷的黑賬上，我們平江革命人民，我們革命烈士的後代，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⑬作為中央喉舌的報章極力把彭德懷與平江起義割裂，其良苦用心在於平江起義作為革命事件沒有辦法否定，要抹黑彭德懷，就只能改造史實。而移花接木是常用的手段——把相近的、看似有點蛛絲馬迹的東西牽連到一起，同時把原本最重要的主幹虛化。

總之，善善惡惡式的評價方式在革命史中屢見不鮮。之所以如此，應該說與政治架構密切相關。在一個集權式的政治架構中，政治權力不僅主導着此時此地，而且穿越時空操控着過往。個體一旦在政治上被打倒，就幾乎意味着遭到全盤否定。集權架構下的政治非黑即白，因此它主導下的歷史敘述也就不存在中間地帶。

五 結語

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說過，過去不一定是被保留下來的，而經常是在現在的基礎上重新建構的^⑭。通過平江起義的事例看，此言不虛。彭德懷的形象來回反轉，實際上就是權力與意識形態相互交織的結果。當然，

建構並非易事，它其實依靠很多技術性手段，如回溯與再解釋、強制凸顯與遺忘，以及無中生有的編造等。通過一點一滴的改動，過去被層級累加，原始圖像早已模糊不清。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並不是要正本清源，還原所謂歷史真相。真正值得思考的是，那些闡述原則是如何形成並發揮作用的。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的逼迫當然是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個體對意識形態的主動迎合，甚至是利用。例如，向中心靠攏的追憶方式就是個體的主動選擇。與其說追憶者遭受壓力，不如說他們是想獲取恩寵。美國經濟學家庫蘭 (Timur Kuran) 有一個觀點，即「偏好偽裝」，意思是說：出於自身利益，或者社會壓力，人們常常在公開場合偽裝自己的偏好，說一些與自己的真實想法完全不同的假話^⑮。從追憶者的種種表現看，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他們中的一些人進行了「偏好偽裝」。個體利益與意識形態的共謀合力改造着歷史。

最後，意識形態所提供的思想分析框架對革命史詮釋有着無與倫比的深刻影響。這是因為，意識形態不僅規範着具體內容的展示 (例如哪些可以說，哪些不可以說)，而且也給追憶者提供了一套分析及看待問題的框架。極端化評價模式、階級話語、集體主義等思維方式和概念工具，是追憶者難以跳出的囚籠。就平江起義而言，不論是詆譏還是讚譽，其實都運用着相近的分析工具。最明顯的是彭德懷獲平反後，那些紀念文章無不是從二元對立的一端跳到另一端。意識形態內化為人的思維結構，言說者日用而不自知，或許才是框定革命史詮釋最重要的基石。

中共革命的書寫與政治權力、意識形態之關聯源遠流長。從延安時期起，毛澤東就有意識利用革命史編撰為政治鬥爭服務^⑯。其後，革命史書寫大都遵循一定的框架，服務於一定的目的。中共這套獨有的政治文化，綿延至今。本文之所以關注平江起義，目的是借助個案研究來揭示這套文化的運作機制。平江起義的「製作」並不孤立，它所運用的手法與技巧，以及「製作者」在此過程中展現的思維結構，在後來的書寫與記憶過程中屢見不鮮。

註釋

①⑱ 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 59；42。

② 轉引自王漢生、劉亞秋：〈社會記憶及其建構——一項關於知青集體記憶的研究〉，《社會》，2006 年第 3 期，頁 49。

③ 王宗峰：〈修復集體記憶——對近年來革命文化再度勃興的思考〉，《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1 期，頁 117-22；郭輝、羅福惠：〈「中共記憶史」研究的提出及構想〉，《中共黨史研究》，2015 年第 4 期，頁 73-79；凌承緯：〈記憶與歷史：中共紀念史研究的新視野〉，《黨史研究與教學》，2018 年第 6 期，頁 24-31。相關實證研究可參見王冰冰：〈黑天鵝與紅衛兵：後革命時代的歷史記憶——論滿族女作家的革命歷史敘事〉，《文藝與爭鳴》，2015 年第 3 期，頁 185-89。

④⑮⑲⑳㉑㉒ 滕代遠：〈平江起義前後〉，載湖南省檔案館、湖南省平江縣委黨史辦公室編：《平江起義資料集》(內部資料，1984)，頁 224-38；231；218；218、219；225；220。

- ⑤ 〈滕代遠關於平、修、銅情況給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1929年1月12日)，載《平江起義資料集》，頁98。
- ⑥ 彭德懷：〈關於五軍、四軍會合後的情況，向中央的報告〉(1929年4月4日)，載《平江起義資料集》，頁128。
- ⑦ 紅軍第五軍軍委：〈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的報告〉(1929年10月)，載《平江起義資料集》，頁171、172。
- ⑧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369。
- ⑨ 〈彭德懷同志在紅三軍團歷史情況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1945年)，載《平江起義》選編組：《平江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4)，頁164。
- ⑩⑪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749；788。
- ⑫⑬⑭ 彭德懷：《彭德懷自傳》(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頁114-15；115；112。
- ⑮ 凌輝：〈平江起義調查報告〉，載《平江起義資料集》，頁1。
- ⑯ 〈滕代遠同志向湖南省委的報告〉(1929年1月12日)，載《平江起義》選編組：《平江起義(資料選輯)》，頁36；吳定邦：〈關於平江起義若干史實問題的辯疑〉，載《平江起義資料集》，頁448。
- ⑰ 〈中共湖南省委致平江特委通告〉(1928年7、8月間)，載中共平江縣委黨史辦公室編：《紅旗漫展出轅門——平江起義資料彙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頁46。
- ⑱ 〈潤仙給湘贛邊特委及四軍軍委的信〉(1928年7月27日)，載《平江起義》選編組：《平江起義(資料選輯)》，頁9。
- ⑲⑳ 潘心源：〈湘東各縣工作報告〉(1929年7月2日)，載《平江起義》選編組：《平江起義(資料選輯)》，頁92；87、92。
- ㉑ 〈蔣長卿關於平江紅五軍情形的報告(節錄)〉(1929年1月20日)，載《平江起義》選編組：《平江起義(資料選輯)》，頁56。
- ㉒⑳㉓ 李壽軒：〈從九都山到井岡山〉，載《平江起義資料集》，頁262、265；258；261。
- ㉔⑳㉕ 黃克誠：〈丹心昭日月 剛正垂千秋——悼念我黨我國和我軍傑出的領導人彭德懷同志〉，《人民日報》，1979年1月3日，第3版。
- ㉖⑳ 爲平江暴動四周年紀念宣言(1932年7月22日)，載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龍岩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頁1497。
- ㉗ 李聚奎：〈參加平江起義〉，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地武裝起義·綜合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頁1140。
- ㉘ 田長江：〈平江起義片斷〉，載《平江起義資料集》，頁276。
- ㉙ 方強：〈憶平江三月撲城〉，載《紅旗漫展出轅門》，頁103。
- ㉚ 鍾期光：《鍾期光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頁26。
- ㉛ 〈中共醴陵縣委羅學瓚關於程潛在湘實行白色恐怖情形的報告〉(1928年6月9日)，載中央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編：《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縣委、蘇維埃、群眾團體1927年—1933年)》(內部資料，1984)，頁103。
- ㉜ 〈夏尺冰巡視湘鄂贛邊境各縣工作的總報告〉(1929年7月25日)，載中央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編：《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省委文件1929年)》(內部資料，1984)，頁194。
- ㉝ 〈蔣長卿巡視湘鄂贛邊境的報告〉(1929年12月20日)，載《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省委文件1929年)》，頁398。
- ㉞ 〈中共瀏陽縣委報告第二號〉(1929年8月25日)，載《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縣委、蘇維埃、群眾團體1927年—1933年)》，頁28。

- ③⑤ 〈滕代遠給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1929年1月12日)，載《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省委文件1929年)》，頁11。
- ③⑥ 〈蔣長卿的報告〉(1929年1月20日)，載《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省委文件1929年)》，頁36。
- ③⑧ 〈湖南省全省清鄉總報告書(節錄)〉，載《平江起義資料集》，頁487。
- ③⑨ 參見《平江起義資料集》，頁487、496、504、511。
- ④⑩④⑪④⑫ 〈滕代遠同志向湖南省委的報告〉，頁54；45；40。
- ④⑬④⑭ 〈彭德懷同志給中央的信〉(1929年4月4日)，載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頁416。
- ④⑮ 〈中共醴陵縣委關於暴動經過的報告〉(1928年2月)；〈中共醴陵縣委工作報告〉(1928年4月11日)，載《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縣委、蘇維埃、群眾團體1927年—1933年)》，頁82、89。
- ④⑯ 鍾期光：〈平江風雷〉，載《紅旗漫展出轅門》，頁110、111。
- ④⑰ 方強：〈平江怒潮〉，載《平江起義資料集》，頁282。
- ④⑱④⑲④⑳ 〈粉碎為大野心家彭德懷翻案的陰謀——平江軍民聲討反動影片《怒潮》〉，《人民日報》，1968年4月10日，第4版。
- ④㉑ 轉引自彭德懷：《彭德懷自傳》，頁107。
- ④㉒④㉓ 李聚奎：〈平江起義時期的彭德懷同志〉，《人民日報》，1979年1月16日，第3版。
- ④㉔ 〈平江起義三十周年座談會記錄(節錄)〉(1958年7月22日)，載《平江起義(資料選輯)》，頁170。
- ④㉕ 〈蔣長卿關於湘東各縣情形，平、修、銅、武各縣情形，紅軍情形和個人工作經過，給湖南省委並轉中央的信〉(1929年1月20日)，載《平江起義資料集》，頁123、124。
- ④㉖④㉗ 〈紅五軍軍委關於平江暴動前後情況和經驗教訓向湘委的報告(節錄)〉(1929年10月)，載《平江起義》選編組：《平江起義(資料選輯)》，頁109；103。
- ④㉘ 〈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的報告〉(1929年10月)，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協作小組、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頁411。
- ④㉙ 〈湘鄂贛邊特委王首道給湘委並轉中央的綜合性的工作報告(節錄)〉(1929年12月2日)，載《平江起義》選編組：《平江起義(資料選輯)》，頁127。
- ④㉚④㉛ 滕代遠：《中國新軍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8)，頁19；37。
- ④㉜ 楊會清：〈「紅五月運動」的興起及其運作模式(1921-1935)〉，《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6期，頁84-91。
- ④㉝ 〈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摘要)——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1967年8月16日，第1版。
- ④㉞ 電影《怒潮》以1928年平江「三月撲城」為素材，反映了平江起義前的革命鬥爭，1963年上映。文化大革命時期，此片被指責是美化彭德懷、為彭德懷翻案。另參見張春玉：〈不是「一條龍」，是條大爬蟲〉，《人民日報》，1968年4月3日，第4版。
- ④㉟ 斯諾(Edgar Snow)著，董樂山譯：《紅星照耀中國》(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頁197。
- ⑤① 庫蘭(Timur Kuran)著，丁振寰、歐陽武譯：《偏好偽裝的社會後果》(吉林：長春出版社，2005)，頁3。
- ⑤②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頁626-36。